

白话三国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白话三国志

第一册 魏书(一)

主 编 曹文柱 柯 彦 建 新
副主编 吕伯涛 张 山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白话三国志

第二册 魏书(二)

主 编 曹文柱 柯 彦 建 新
副主编 吕伯涛 张 山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白话三国志

第三册 魏书(三)

主 编 曹文柱 柯 彦 建 新
副主编 吕伯涛 张 山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5-110

白话三国志

第四册 蜀书

主 编 曹文柱 柯 彦 建 新
副主编 吕伯涛 张 山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622330/113

白话三国志

第五册 吴书(一)

主 编 曹文柱 柯 彦 建 新
副主编 吕伯涛 张 山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60.36/10

白话三国志

第六册 吴书(二)

主 编 曹文柱 柯 彦 建 新

副主编 吕伯涛 张 山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秦 人 华 山

封面设计：郑志标

封面题签：启 功

白话三国志

曹文柱等 主编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8420077-2218)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65 印张 1615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8000 册

ISBN7-81001-611-3/K·81

定价：48.00 元(全六册)

(本版图书有错误者本社负责调换)

《白话三国志》编委会

主 编 曹文柱 柯 彦 建 新
副主编 吕伯涛 张 山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建民 孙建军 李 兵
李鸿宾 张国杰 陈 理
岭福祥 梁 民

前 言

在二十四史中，陈寿的《三国志》是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成就最高的一部著作。裴松之的《三国志》，则在史注中别树一帜，给予后代史学，特别是注史工作以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陈书、裴注已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三国史的第一手资料，其重要性是任何典籍也无法取代的。因此，我们这套《白话三国志》把陈书与裴注一齐译出，以使读者得到全面的认识。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人。

陈寿出生在三国鼎立时期的蜀国，少年时期受学于同郡的经史大师谯周。谯周潜研古史，著述甚多，以专为《史记》纠缪的《古史考》有名于世。在谯周的薰陶和教育下，陈寿自幼精读《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古史，对史书的体裁和编撰方法有过深入的研究。幼时的努力为他以后所取得的史学成就准备了条件。在谯周的学生中，陈寿是较为突出的一位，时人把他和文立、李虞、罗宪并列为谯门四大弟子。陈寿博闻强识，文思敏捷，深得谯周器重。成年后，陈寿先后在蜀汉政权内担任过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和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务。蜀汉末年，后主刘禅昏庸无能，朝政被宦官黄皓把持。许多臣僚为保住自己的官位，都向黄皓阿谀献媚，只有陈寿不肯同流合污。黄皓十分嫉恨他，屡次借故进行谴黜。偏偏陈寿又不愿为世俗藩篱所约束，极易授人以柄。

在居父丧期间，他因为有病，使用侍女调制药剂，结果触犯礼教，受到舆论的谴责，遂沉废累年不能任官。

炎兴元年（263年）魏兵攻入益州，后主刘禅投降。蜀亡之后，曹魏政府把刘禅连司大批臣僚迁到中原，陈寿也随之到达洛阳。两年后，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王朝。陈寿受到乐于延誉后进的中书令张华的赏识，被举荐为孝廉、佐著作郎，出补平阳侯相。这期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委托他编辑诸葛亮故事。泰始十年（274年），陈寿汇集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上奏朝廷。他的同学文立又把陈寿撰写的《益部耆旧传》呈献给司马炎。司马炎十分欣赏陈寿的才能，提升他为著作郎，并兼领本郡中正的职务。

太康元年（280年），西晋灭吴，从而结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割据状态，中国重归统一。至此，陈寿开始搜集资料，为三国写史。过了若干年，他终于写成魏、蜀、吴三书，总其名为《三国志》。《三国志》一成，凡是见过稿本的人都赞不绝口，称赞陈寿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张华更把陈寿比作是司马迁和班固，并表示要把修晋史的任务也交给他来做。当时，夏侯湛正在撰写《魏书》，见到陈寿的书后，觉得自己的工作已没有意义，遂毁掉了书稿。由于《三国志》属于陈寿私人的撰述，所以在当时它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直到陈寿死后，朝廷才命人到他家抄写。《三国志》也并非人人都满意，权臣荀勖读后就心情不快，因为陈书中有的写法触犯了他的忌讳。再加上荀勖与张华是一对政敌，张华欣赏陈寿，自然荀勖看陈寿处处不对眼。荀勖不愿陈寿在内廷为官，借故将他排挤到长广去作太守。陈寿以母亲年老有病为由，不肯就任。经过镇南大将军杜预的推荐，朝廷乃改授他为御史治书。不久，母亲去世，他遵遗嘱葬母于洛阳。不将母丧归葬原籍，这在当时也是违礼的。清议谴责陈寿有悖伦常，遂使他再受废辱。数年后，他才被重新录用，起为太守中庶子，但因年迈病重，尚未就职就去世了。这一年是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陈寿六十

五岁。陈寿一生仕途，很不顺利，《华阳国志》曾说他“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

《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它以纪传体裁写成，记事始于汉少帝光熹元年（189年）董卓乱政；终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孙吴灭亡，前后九十余年。

在《三国志》成书之前，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书籍大致有官修和私修的两种。前一种如王沈的《魏书》、韦照的《吴书》；后一种如鱼豢的《魏略》等等。这些书籍都为陈寿撰写《魏书》、《吴书》提供了基本素材。但在修《蜀书》时，陈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评曰》）。蜀汉既然无史书可借鉴，所以关于它的历史则全靠陈寿自己之力来搜集了。好在陈寿是蜀人，对故国的史实比较了解，又曾写过地方志和整理过诸葛亮等材料。故尔经过努力，《蜀书》所收，虽不及魏、吴两书丰足，但也毕竟独立成书了。

《三国志》的成就很大，其质量远远超出同时代其他人撰写的三国史，被后人誉为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司马）迁、（班）固，非亡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史学观点与材料选取的统一，作者杰出的史识和史才也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这大概就是陈书一出，众家三国史日渐销沉、散佚，终不见流传的一个原因吧！

《三国志》的成就，首先是陈寿为适应三国鼎立的历史特点，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自从《史记》建立起以帝纪为纲的体

系以来，后代许多史家往往不顾所述历史的时代特点，而跟在司马迁后面依样画葫芦。像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孔衍的《魏尚书》、孙盛的《魏氏春秋》、郭颁的《魏晋世语》等，都把统一王朝的叙史形式照搬过来，只承认魏国是正统，而把吴、蜀两国划为“僭伪”，故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原貌。陈寿则正视魏、蜀、吴是三个各自独立、互无从属关系的割据政权这一史实，把它们放在对等的地位上，将三国的历史分写成三部书。虽然由于生活在继魏之后统治中国的晋政权之下，他不得不采取以魏主为纪，以吴、蜀两国之主为传的手法，以掩人耳目。但在具体写法上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吴、蜀之主虽均曰传，然皆编年纪事。于史家之例，实亦纪也”（《义门续书记·三国志》）。陈寿在叙史过程中，竭力于字里行间将蜀主、吴主的位置与魏主摆平。如在《蜀书·先主传》中，他详录了蜀臣的上符端书、诸葛亮劝进表及刘备即位告天文等，所用笔墨比曹丕称帝还多。在不少传中，陈寿干脆将刘备直接写作“昭烈皇帝”。在《吴书》里，他又称孙权为“至尊”，叙述孙权称帝的文字也不比曹丕少。陈寿对三家国主所发布的旨令，称帝前一律用“令”，称帝后则一律改作“诏”、“敕”。按照当时“五德终始”的观点，汉是火德，代汉而立的新朝必然为土德。陈书记载魏、蜀、吴三家建国，都承认它们有种属于土德（色尚黄）的征兆。如写曹丕称帝，数言“黄龙见谯”；写刘备即位，则云“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写孙权正尊号，又说“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史通》的作者刘知几没有弄清陈寿的真正用意，从论辨史书体例的一般规律出发，批评《三国志》“未通纪、传之情”，着实冤枉了陈寿。在北宋以前，魏、蜀、吴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却反证三书是互相独立的三部。直到北宋雕版刻书，才将它们合为一种。可见，在陈寿的心目中，三国的关系是对等的，无主从关系。

其次，《三国志》的成就是结构清晰。全书前后贯穿，事无重复。在全局安排上，陈寿颇费匠心，几乎所有的选题都是紧密围绕着他三国历史的总看法处理的。正如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三国志》外表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陈寿叙史不由曹丕代汉时（220年）起，而是把它提前三十多年，从董卓乱汉（189年）时写起。这是因为东汉自此时起已名存实亡，由动乱逐渐形成三家对峙的局面。而曹丕代汉，只是走个过场而已，于历史格局影响不大。陈寿想通过对《三国志》的记叙，反映出东汉末到晋初整个中国社会的全貌。为服从这一主旨，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挈本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三书以叙述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和终结。他通过各个时期重要人物的传记，记述了董卓之乱及乱后的群雄四起；刘焉、刘表、孙策和公孙度等人的割据活动；官渡战后曹操的天下无敌，赤壁战后的三国并立，夷陵战后蜀吴两国的合作和南北对立；他还交待出魏明帝之后幼主继位和曹爽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权晚年猜忌好杀埋伏下了东吴败亡的危机。陈寿作传，照顾面很广，除三国国主外，汉末诸雄、后妃、宗室、谋士、武将、循良、清名、叛臣、方技及边族等，无一不在书中露面，以期对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各方面的情况都有反映。但在具体行文上，陈寿并不平均使用篇幅，而是根据重要程度的区别，或立专传，或用附见。全书剪裁得十分合于布局的需要。

《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的弊病。这种简洁不仅表现为文字上的精炼，而且表现为取材的审慎。如当时关于曹操先世及早年的传说很多，《魏书·武帝纪》一概不取。汉魏禅代之际的表奏册诏，仅裴注就引有二十余篇，而陈寿只选取了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册命，即将这一史实表述清楚了。他写《诸葛亮传》更是审慎斟酌。如《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述刘备与诸葛亮的最

初相识，都是讲诸葛亮自己去见刘备的。而陈寿则根据诸葛亮《出师表》的自述，采用刘备三顾茅庐的记载。另外，他还舍弃了经不住推敲的材料，如七擒七纵孟获、阳平关设空城计等等。陈寿不录《后出师表》，不只是因为它出自吴人张俨的《默记》，更主要的还是文章所述的内容于史多有乖舛，于诸葛亮本人的思想也不大合拍。《三国志》的文笔虽然简洁，但很传神。其写名士的风度，谋士的干略，武将的勇猛，曹操、刘备和孙权的雄才，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如《吴书·鲁肃传》讲：“（刘）备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惟（鲁）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寥寥几笔，勾画出了刘备在曹操心中的份量，再现了当时三方势力纵横捭阖斗力斗智的鲜明图景。

陈寿不仅叙事简要、取材精审，而且议论也有一定的见地。纪传后面的评，集中反映他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看法。如他评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擘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评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评关羽、张飞“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后世学者多认为陈寿的这些评论，褒贬适当，是值得肯定的。

后人对《三国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陈寿在某些地方使用曲笔和有所回护。唐人刘知几和清人赵翼分别在《史通·直书》和《廿二史札记》卷6中，列举事例证明《三国志》有为魏晋两朝当权者隐恶溢美的地方。确实，曹操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在陈寿的笔下似乎都不是他本人强行所为，而是汉献帝对他感恩报德的结果。以后司马懿为丞相，司马师加黄钺，司马昭封晋公，司马炎受禅即帝位，也像是出于魏朝皇帝的自愿。魏君

曹芳被废，是司马师搞的阴谋，太后被蒙在鼓里，《魏略》对此记载得十分详尽。陈寿则一概回避不谈，反载太后之令，极言曹芳不孝当废；魏君曹髦惨遭司马昭死党的毒手，陈寿但书其“卒”，对其被杀之事含糊其词。曹爽从小以谨慎稳重为魏明帝所信赖，掌权后不幸遭到司马懿的暗算，成为被晋朝否定的人物。陈寿作传时，对曹爽的阴暗面也写得更多了一些。对于陈寿这种笔法，我们不应该肯定，但需实事求是地看待。他身为晋臣，处境很难，不敢不为晋讳。陈寿性格固然刚直，但屡受挫折，且又目睹了许多不与晋朝合作的名士悲惨下场，这使得他不能不对直书的结果进行考虑。如果坚持直笔书史，除了招致杀身之祸，书被禁毁，才智不显，抱负不酬，还能得到什么？陈寿对统治者比较敏感的某些史实委婉其辞，完全是为了避免司马氏政权的迫害。当然，同样是有成就的史家，陈寿与不畏强暴、勇于揭露黑暗政治的司马迁相比，则大为逊色。即使这样艰难，陈寿并不甘心，还是想尽办法，在字里行间努力透露一些历史的真相，体现出一位史家的道德和良心。如在《三少帝纪》中，他虽于曹髦卒后引太后令称其“悖逆不道”、“情性暴戾”，但在本纪的正文中却用很多篇幅写曹髦的通情达理、勤于政事、好学不倦和尊老敬贤。如其即位之初便“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又“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被杀前还下诏“养老兴教”，立“三老、五更以崇至敬”等等。陈寿这样写，显然在暗证晋廷给曹髦所加的罪名是不实之词。

《三国志》虽然存在曲笔和回护的弱点，但陈寿的史德并不像《晋书·陈寿传》记载的那样差。关于陈寿索米不得遂不为丁仪兄弟立传以及因父受刑就极力贬低诸葛亮的两件事，纯属漏洞百出的流言。后世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清人朱彝尊、王鸣盛、赵翼等极力为陈寿辩诬，称“寿于魏文士，惟为王粲、卫觐五人等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觐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干、陈琳、阮瑀、

应瑒、刘桢，仅于粲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曝书亭集》卷59）；又称“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评中反复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十七史商榷》卷39）。近人又揭丁氏遭天门之祸，并无子嗣，陈“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也并不是陈寿的诋毁之词，而是当时及后世许多人的共同看法。通观全书，可以说陈寿修史并不以私人恩怨而施褒贬，两种流言不足为信。

陈寿相信天人感应和皇权神授的说法，在《三国志》中有不少宣扬这种观点的文字。如他记官渡之战曹操破袁绍，称五十年前就有黄星作预兆。陈寿写曹丕、刘备、孙权称帝时，曾列举大量的符瑞图讖，说明三家立国都是天意的反映。晋魏禅代，他说魏家“天录永终，历数在晋”，同样是符合天命。陈寿十分推崇老师谯周以及周群、杜琼等人的占候之术，通过为他们立传表达自己的皇权神授观。如他把谯周的“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受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的说法，同蜀亡联系起来，说明这种预言是可以应验的。除了天命论外，他同时强调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如陈寿认为曹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还认为诸葛亮的奇策对三国鼎立起着重要作用。但到人力与天命发生矛盾时，陈寿却主张天命无敌。所以在《诸葛亮传》后的评中，他无可奈何地写道：“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同《史记》、《汉书》相比较，《三国志》在体例上有一个重大缺陷：它没有志和表。后世的学者多把原因解释为陈寿手头资料不足所致。另外，陈书过于追求文字的简洁，以至对很多重要历史事件交待得不够详尽，这也是它的不足之处。

为了弥补这些缺陷，后世学者做了很多工作。如陶元珍的《补三国食货志》、王欣之的《补三国兵志》、洪亮吉的《三国疆域